

朱新茂 著

西魏隋唐
五代十國
貨幣圖說

文物出版社

西魏隋唐五代十国貨幣圖說

朱新茂題

朱新茂 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5



封面設計 張希廣

責任印製 王少華

責任編輯 竇旭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魏隋唐五代十國貨幣圖說/朱新茂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5

ISBN 7-5010-1669-0

I. 西… II. 朱… III. 古錢(考古)—中國—西魏
(534~557)~五代十國時期—圖譜 IV. K875.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00950號

西魏隋唐五代十國貨幣圖說

朱新茂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五四大街 29 號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787×1092 1/16 印張: 26.25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669-0/K·867 定價: 180 圓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唐雙寧先生為本書題詞：“情在泉幣”

序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工作關係，我與新茂同志相識，那時他在中國人民銀行運城地區中心支行做保衛工作。印象中，他對工作認真負責。隨着錢幣收藏和研究的日益活躍，從別人口中得知，他對錢幣的搜集和研究十分用心。後來，由于工作崗位的變動，我和他的接觸就很少了，祇是偶爾聽到他的一些情況。

今年3月初，我去運城出差，新茂同志去看我，說他的《西魏隋唐五代十國貨幣圖說》即將殺青，希望我為他的書作序。4月1日，他到太原送書稿，由于我當時在香港而未能見面。待我返回，見到新茂同志的書稿，不禁為之震動。一是560多頁的書稿，足有兩寸厚，整整齊齊，工工整整，一看就知道新茂同志是個極為嚴肅認真的人。二是沒有想到一位原來做保衛工作，後來從事紀檢工作的同志，居然對古錢幣研究得這樣深入，令人起敬。三是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在業餘完成的，走過了十八年艱辛路程，沉甸甸的書稿浸透了新茂同志的汗水，他是把收藏與研究錢幣作為一項事業去追求、去奮鬥、去奉獻的。

中國錢幣是中華民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古發現證實，殷墓中已有銅貝出土，這說明我國早在商代就已經正式鑄造銅貝貨幣或者說銅錢了。秦統一貨幣鑄行半兩錢，至漢代，隨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錢幣進入第一個大發展期。唐代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中國錢幣進入第二個大發展期。宋代經濟發展，科技發達，中國錢幣進入第三個大發展期。

隋朝錢幣品類單一，只有“五銖”一種。隋五銖的形制與西魏五銖有繼承關係，再遠還可追溯到漢五銖。隋五銖錢雖然單一，但要斷定爐別，即鑄于何地，還是比較困難的。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朝，建元武德，仍用隋五銖舊錢。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因隋末惡錢泛濫，遂廢五銖，行新錢，開唐朝三百年鑄行開元通寶之端。中間雖鑄過其它錢文的錢幣，但仍然以開元通寶為主，其餘多種錢幣，都使用不久即廢止。開元通寶的出現宣告了自秦以來流通了八百餘年的銖兩貨幣的結束，它的文字、形制成為後世的楷模。從此以後，中國的方孔圓錢，多以元寶、通寶、重寶相稱。開元通寶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五代十國的貨幣五花八門。五代鑄錢不多，各種遺留錢幣數量多寡懸殊，後梁、後唐極少，後晉、後漢、後周較多。十國錢幣多屬減重大錢，有的用鉛鐵鑄錢，質量低劣。五代十國錢幣的混亂，反映了當時政治分裂、戰爭頻發、社會動蕩的現實。

研究古錢幣，可以總結我國歷史上貨幣發行的經驗和教訓，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做到古為今用，更好地為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服務。有的錢幣鑄行時間很短就廢棄，而開元通寶自唐高祖創立後，在唐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中基本沒有變動過，在此後的五

代和宋元明清各朝一千多年，銅錢體制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這些都需要從貨幣制度上去探求。新茂同志對隋唐五代十國錢幣分類的研究，是一項具有開創性的工作，因而也是十分有益的工作。

我對古錢幣瞭解甚少，為新茂同志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為他十八年艱辛研究的精神所感動，因此寫了這些話。是為序。

張紹瑞

2004年4月26日

前言

這是一部關於古錢幣分類的書。此前，在中國錢幣學界，凡泉友們談到唐錢尤其是唐開元錢的收集與研究時，無不搖頭稱難，特別是唐開元錢的種類和版別難于弄清楚。在已出版的古錢幣書裏，羅列唐錢版別很多，其中亦不乏珍品，但多混合雜亂，令讀者眼花繚亂，猶如一團亂麻難以理出個頭緒來。究其原因，是沒有分類造成的。因此，長期以來唐錢的研究難以有突破性的進展，各類開元錢的斷代則更加困難。

衆所周知，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唐錢未做分類，無疑是長期制約唐代錢幣收集與研究的瓶頸。錢幣為什麼要分類并冠以名稱呢？譬如一個單位千餘人，如果沒有姓名，你要尋找某人是很困難的。人有男女、高低、胖瘦、黑白和老中青少幼之分，錢幣也有文字、書法和大小、輕重、厚薄、精粗之別。錢幣分類與冠名的目的在于使人一目了然，迅速查找到古錢幣的種類和版別，方便收集、鑒賞和研究。通俗地講，就是為後來者集幣和研究起一個牽線搭橋的作用，這也正是錢幣分類的重要性所在。為此，錢幣收藏愛好者和研究者都亟盼一部這樣的工具書面世：既有可供收集和研究用的可靠分類資料，又最終有助於解決鑄地、鑄爐和斷代的問題。但為何在我之前，自中國唐代以來的一千餘年間沒有人做成這件事情呢？我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具備條件，難度大，其艱苦程度令人望而生畏；二是有確切紀年的錢幣不多，如何分類難以下手。隨着時間的推移，根據錢文筆畫書寫不同加以分類的科學性愈發顯現出來，各時代的錢幣都有其特色及所處時代的烙印，如同小篆書體不會早于秦代因而具有斷代標尺作用一樣。出版一部關於唐錢分類的書，成為當今中國錢幣學界在這一研究領域內能否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關鍵。考慮到在中國歷史上習慣把隋唐五代十國放在一個大的板塊內，本書就采用了這一常用做法，算是一個大的專題吧。至于加上西魏，主要原因是考慮到西魏貨幣在中國貨幣史上的獨創性和對後世鑄幣的影響，它是隋代鑄錢的楷模，研究隋錢不能不聯繫到西魏貨幣。

1986—2004年的十八年間，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一段時光。為實現理想，我付出了健康，透支了生命，對身心遭遇的損害全然不顧，所吃的苦受的累一言難盡。聊以自慰的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歷經艱辛，《西魏隋唐五代十國貨幣圖說》終於成書，既可作入門初學者集幣、交易之參考，又是研究者必備之工具書。自此，中國錢幣學界在這一研究領域有了可靠的分類資料，初步解決了制約這一歷史時期貨幣收藏和研究的瓶頸問題，對最終解決貨幣斷代問題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填補了中國錢幣學界在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所做的工作雖難盡人意，但總算有了一部工具參考書，以解收藏和研究之急需。權作一家之言，拋磚引玉吧。

我在編著本書過程中，參閱了數百本錢幣學及相關的書刊雜誌，選用了百餘本書中的部分錢幣資料，吸收了泉界近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特向有關的作者致謝。中國銀

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山西監管局局長張紹瑞先生在百忙中爲本書作序，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中國錢幣學會秘書長戴志强先生不辭勞苦對初稿進行了審閱并題寫書名，北京郵電大學文福安教授對初稿的修改提出了寶貴意見，中國銀監會唐雙寧副主席在繁忙的工作中爲本書題詞，中國銀監會培訓中心王世強主任、統計部劉成相主任和山西銀監局曠仁山副局長在本書的後期工作上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幫助。在此，謹向以上諸位特致衷心的感謝。

本書出版後，我期待着國內外讀者的寶貴意見，以便再版時繼續修改、補充和完善，更好地爲讀者服務。我的通信地址是“山西省運城市 18 號信箱”，歡迎來信。

作 者

2004 年 3 月 19 日初稿于運城

2004 年 7 月 16 日定稿于北京

概 論

公元420年，中國進入了南北朝時期。南朝地處長江以南，都城在建康，歷經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公元589年(禎明三年)正月，陳後主被隋軍俘虜亡國，南朝結束，共計169年。與南朝相對應的是北朝，北朝建都分別為平城、晉陽、洛陽、長安，所轄範圍均在長江以北，歷經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五個朝代。公元581年(大定元年)二月，楊堅廢九歲的周靜帝，自立為帝，北周滅亡，北朝計196年。在中國歷史上南朝與北朝幾乎是同時并存的，南北朝所鑄行的十餘種貨幣形制、錢文既相互借鑒，又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西魏所鑄五銖開五銖錢之先河，是隋代鑄錢的楷模。長期以來，由于歷代錢譜將其列入隋錢類，人們一直把西魏五銖錯當成隋文帝開皇年間鑄行的開皇五銖或置樣五銖，以至于今天仍有人誤稱其為隋五銖大樣錢。

據《北史·西魏文帝本紀》記載，西魏文帝鑄錢有兩次。首次是大統六年(公元540年)的二月，其次是大統十二年(公元546年)的春二月、三月。但兩次鑄錢究竟鑄的何種錢，史書記載不詳，且無考古實物作依據，因此，國內泉界衆說紛紜。

1984年，陝西省咸陽市渭城區胡家溝倉張磚廠發現了一座西魏墓。據墓志記載，墓主侯義官封太師開府參軍師，為北魏武陽公侯剛之孫，燕州刺史侯淵之子。經考證，侯義葬在西魏大統十年(公元544年)，棺內共有銅錢40枚，除一枚永安五銖外，另39枚均為錢面穿右有一豎畫連接“五”字上下兩橫的闊緣五銖，直徑25毫米，外郭寬3毫米，厚1.5毫米，穿徑8.5—9毫米。其中9枚重4.1克，22枚重3.75克，8枚重3.4克，平均枚重3.76克，比以往出土的隋五銖都重。這個明確的紀年使墓中出土的五銖錢具有了斷代標尺的價值，表明隋五銖形制的錢是沿襲西魏大統六年五銖而來。至此，隨着西魏墓的考古發掘，長期以來國內錢幣學界圍繞這種五銖錢的歸屬之爭也就烟消雲散了。以科學發掘的西魏五銖作為斷代標準，西魏大統六年所鑄為何種錢的問題終于一錘定音地解決了。

大統十二年所鑄為何種錢的問題，目前泉界有兩種說法。一說認為大統十二年鑄錢形制、大小、輕重仍與六年相同。原因有二：一是史書未說到十二年鑄錢減重。二是大統七年(公元541年)，西魏在丞相宇文泰的主持下，總結歷代治國經驗，整理成施政綱要，作為詔書下達給群臣，史稱“六條詔書”。西魏首創府兵制，推行均田制。通過這些改革，西魏取得了豪強地主集團的支持，國家日益強盛起來，有效地抵禦了東魏的進攻。根據我國歷代鑄幣發展的一般規律，初鑄的錢往往足重，而後鑄的錢由于國勢衰弱，常會發生減重現象。然大統十二年西魏正處於國家實力的鼎盛時期，不可能鑄減重錢。另一說認為“大統十二年的五銖，大概只是六年五銖的減重，因為東魏已在三年前實行減重”(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223頁)。如果前一種說法正確，那麼西魏十二年鑄錢的問題就解決了；如果後一種說法正確，西魏大統十二年鑄何種錢的問題就還沒有完。問題是減重到何種程度，減重

錢與隋錢的區別在哪裏。有人說，隋“斜畫微弧五銖”要改寫為西魏貨幣了，因為這種五銖形制的錢除了比西魏大統六年五銖輕小外，幾乎沒有任何不同。但從近年小型“斜劃微弧五銖”出土量較大的情況看，認為這種錢是西魏大統十二年鑄的減重五銖的說法似難以成立。綜上所述，由于史載不詳，目前又無斷代依據，這些問題尚一時難以辨清，仍有待今後文物工作者對有確切紀年的西魏墓進行科學考證來解決。因此，西魏大統十二年所鑄為何種五銖錢的問題也只能暫時擱置起來。

西魏五銖多背素無紋飾，少量背有月痕。此前，泉界多認為背月痕錢在唐代才開始出現，現在看來至少在西魏所鑄五銖錢背上就已經出現了。由于月痕多是冶鑄過程中成品錢從高處掉下砸模後所形成，所以，背月痕錢可以出現在中國任何一個朝代的鑄錢上。事實也的確如此。背月痕錢除收藏者獵奇和對研究其鑄造方法有價值外，沒有其它特別的意義，嚴格來講，背月痕錢是一種不合格的產品。

西魏鑄錢在中國貨幣史上的重要性，一是具有開創性質。它是後來隋代鑄錢的楷模，因為西魏以前鑄行的五銖穿孔右側均無一凸出豎畫與“五”字的上下兩橫連接起來。二是具有斷代意義。此前泉界人士多認為這種錢是隋開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所鑄。西魏墓的發現證實了彭信威教授關於這種五銖“開鑄是在西魏”論斷的正確，較史書記載提前了41年。三是對後世鑄錢的影響。首先是錢文形制特徵對隋代鑄錢的影響。我們知道，隋代所鑄五類五銖，皆為錢穿孔右側有一豎畫連接“五”字的上下二橫畫。其次是鑄錢輕重大小對唐代鑄錢的影響。衆所周知，唐會昌以前，尤其在唐初各鑄錢州郡所鑄標準開元錢工藝精美，直徑多在25毫米左右，重量約4克，與西魏五銖錢徑、重量大致相等。開元錢後來變小變輕，說明唐晚期政治經濟走下坡路了，不能怪罪唐代貨幣制度本身。

西魏自元寶炬于公元535年稱帝起，至公元557年恭帝退位讓國止，歷經三帝，共23年。從大統六年鑄錢始，至亡國，鑄錢僅17年時間。西魏五銖錢文深峻，輪郭周正，大小輕重適中，攜帶交易方便，惜立國時間短，流通範圍小，流傳下來的錢不多。

公元581年，楊堅滅北周建隋朝，至公元618年隋煬帝楊廣被殺止，歷經四帝（實則二帝），計38年。其中，隋文帝在位24年，隋煬帝在位14年。

在楊堅建國初期，全國各地使用的錢幣是非常混亂的。關隴地區，除使用北周的五行大布(一抵千錢)和永通萬國錢(一抵十錢)外，還使用北魏所鑄的太和五銖錢；梁(陝西南部)、益(四川)地區，又雜用古錢交易；山東地區，猶雜用北齊舊錢(常平五銖)；河西(河西走廊)諸郡，還使用西域金銀錢。錢幣不統一，妨礙了全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隋書·食貨志》稱：“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熔鑄。三年(公元583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開皇四年(公元584年)，詔前代舊錢，“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開皇五年，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開皇八年(公元588年)十月，起兵南下伐陳，首

尾不到四個月，就輕而易舉地攻下了建康。滅陳以後，廢陳氏舊錢，在江南推行隋朝新錢。這樣，全國行使的錢幣就漸漸統一起來了。隋王朝在統一貨幣的同時，還統一度量衡，頒行開皇新制，市上交易，依爲標準。錢幣與度量衡的統一，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隋朝後期，煬帝楊廣開運河，建東都，又三游江都，三伐高麗，把廣大人民拖入無窮的徭役和兵役的苦難中。尤其在江都一帶，賦稅沉重，民不聊生，沒有糧吃，樹皮草葉也吃光了，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民間私鑄錢的問題亦日趨嚴重，由隋初的每千錢重四斤二兩減爲二斤，後又減爲一斤，最後竟剪鐵葉、裁皮、糊紙以爲錢。李淵率兵攻入長安的時候，民間用絰環錢，凡八九萬才滿半斛。隋煬帝政治上的殘暴，生活上的奢侈，通貨的膨脹，貨幣的貶值，經濟的崩潰，終於導致了隋朝的滅亡。

隋代除中央在長安、東都皇城設東西錢坊鑄行五銖錢外，楊堅的三個兒子也取得了鑄錢權。開皇十年(公元590年)，晉王楊廣在揚州立五爐鑄錢；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漢王楊諒在并州立五爐鑄錢，蜀王楊秀在益州立五爐鑄錢。而楊廣又借口江南錢少，于鄂州白紵山置十爐鋼銅鑄錢。在現代，弄清隋錢的種類、多寡，對於研究隋中央及楊氏三兄弟所鑄爲何類錢無疑是有幫助的。

隋代專行五銖錢，根據五銖錢文的書寫筆畫不同可分爲五類，共同特徵是錢面穿孔右側一豎畫連接“五”字的上下兩橫畫。其中三類錢鑄量較大。第一類，“斜畫微弧五銖”。其特徵是：“五”字交股處微有弧度，近似直畫，國內泉界通稱“直筆五銖”。這種錢是隋開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沿襲西魏五銖的錢文形制特徵，在全國統一鑄行的標準五銖錢。由于民間私鑄嚴重，官府于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在各關以百錢爲標準，京師和各州也都立榜置樣，符合標準可通過，不符合標準者沒收重新冶煉鑄造，後世稱爲開皇五銖或置樣五銖。“法重”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據鐵權所得一斤合693.1克，枚均重2.86克。由于隋文帝在開皇年間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貨幣管理政策，從而確立了開皇五銖在流通領域的主導地位。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出土情況看，“斜畫微弧五銖”是隋錢中鑄量最大、出土最多的一類錢，可能屬隋中央所鑄標準錢幣。與西魏五銖相比較，除了錢輕徑小外，幾無差別，難怪有人認爲屬西魏大統十二年(公元546年)所鑄減重錢，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類，“曲筆五銖”。其特徵是“五”字交股曲筆，直徑21—23.6毫米，重2.05—3克。此種錢多含有錫鐵，顏色發白，泉界俗稱“白錢”。當然也有不發白的。從這種錢多出在湖南長沙及江南一帶的情況看，或如彭信威先生所說的，這種曲筆五銖很可能就是楊廣在揚州及鄂州白紵山所鑄之錢。因楊廣鑄錢爐有15座之多，這種曲筆五銖錢的數量雖然不可能有“斜畫微弧五銖”錢那樣多，當也不會太少。第三類，“右筆連輪大字五銖”。其特徵是“五”字上下三角的右畫連接外緣，而非連接上下兩橫畫，交股處弧度大于“斜畫微弧五銖”，而又小于“曲筆五銖”，介于兩者之間。錢文筆畫粗重有力，文字較大，直徑22.5—23.8毫米，重1.9—3克。從收集情況看，這類五銖的鑄量小于前兩類。另兩類爲“交股錯位直畫五銖”和“交股星點錯位五銖”，鑄量皆少于前三類五銖錢。隋五銖按錢文筆畫書法不同可

分爲五類，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錢文書法的不同和鑄量的多寡，似乎跟楊堅的三個兒子與中央在長安和東都洛陽所鑄錢的鑄地、爐數的不同相關。

隋五銖錢面背鑄有星月痕的情況，在隋代已經少量地出現在所鑄錢上了。星月痕的大小不等，它可以發生在錢面或背的任何部位。它是工匠在鑄幣過程中無意或偶然造成的。因此，屬於“無意識、無規則、任意部位背星月痕的發生階段”。隋五銖錢上出現的星月痕，由于并非鑄幣制度本身所規定，因而并無特殊意義。但由于在流通錢中只占大約2%左右，所以物以稀爲貴。在現代，收集這類錢，一方面，對於錢幣收藏家和鑒賞家來講，增加了新的版別，閑暇把玩欣賞，樂趣無窮，具有收藏價值是毫無疑問的。另一方面，對於錢幣研究者來講，增加了新的實物貨幣版別，對於探索星月紋的起源、演變及鑄錢工藝有重要意義，具有研究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銅或銅與其它金屬的合金中含有一定量的鐵，這種錢用磁石可吸起，稱爲含鐵錢。隋代所鑄“斜畫微弧五銖”和“右筆連輪大字五銖”皆發現有含鐵錢。此前，國內泉刊無報道，也少有人研究。這種錢體呈綠銹或鐵銹或綠銹間有鐵銹色，常被誤爲銅錢或鐵錢。含鐵錢究竟是鑄工有意按一定金屬比例所鑄，還是因爲當時工藝落後無意中造成，由于《隋書·食貨志》無記錄，目前鑄造這種錢的原因尚不清楚。

五金鐵錢與隋五銖沒有共同之處。首先，就其錢文來講，它不稱五銖，而稱五金；其次，它有穿郭，而隋五銖沒有；再次，五金鐵錢直徑爲23—25毫米，而隋五銖直徑沒有超過23.8毫米的。目前，一說五金鐵錢鑄于隋末，一說鑄于五代後蜀廣政年間(公元938—965年)。現在看來，兩說皆不能肯定。五金鐵錢的斷代仍是需要繼續考證的問題之一。筆者以爲，就五金鐵錢有內郭的形制來看，它極有可能由北周錢幣仿鑄而來。

隋代所鑄五銖錢，在中國貨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是隋五銖是隋文帝統一中國後在全國行用的唯一法定貨幣，鑄行時間38年，它的影響和所起的作用大于西魏五銖。而西魏偏居于一隅，只占中國的一部分，鑄錢流通範圍小，行用十余年就亡國廢止了。二是隋五銖在中國貨幣史上的過渡性。五銖錢自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開鑄，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廢止，前後鑄行七百餘年，皆以重量爲錢名，儘管有時名不副實，但仍然屬於所謂稱量貨幣的範疇。隋以後，歷代鑄錢就不再以重量爲錢名，而改用通寶、元寶、重寶和其它什麼寶了。

公元618年(大業十四年)三月，隋煬帝被殺，同年五月，李淵在長安稱帝，建立了唐朝。當時民間交易仍用前朝舊錢。“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綮，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仍置錢監于洛、并、幽、益等州”。“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至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舊唐書·食貨志》)。後“以商賈不通，米帛踴貴，復行開元通寶錢”。“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游

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公元712年)之際，兩京錢益濫，“(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天下[鑄錢]爐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鄧、]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爐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鐵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新唐書·食貨志》)。“安史之亂”發生後，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每緡重十斤，行使時，以一當十。及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鑄重輪乾元錢，每緡重十二斤，以一當五十，和開元通寶三品并行。“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代宗即位後，開元通寶、乾元重寶、重輪乾元重寶“皆以一當一”，“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輪(即重輪乾元重寶)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新唐書·食貨志》)。大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關內道鑄錢等使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源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許之”(《代宗實錄》)。“建中初(公元780年)，戶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爐，歲鑄錢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新唐書·食貨志》)。大曆建中初鑄的是何種錢史無明載。大曆元寶和建中通寶鑄地說法不一，一說是唐安西都護府在新疆庫車地區鑄造的，一說爲唐代中原、新疆兩地所鑄。中原鑄幣爲青銅，新疆鑄幣材質爲紅銅。

公元870年(咸通十一年)，桂陽監鑄造成通玄寶錢(《泉志》引舊譜)。

唐朝立國289年，第一種也是最主要的貨幣當數開元通寶，其次是乾元重寶錢。

開元通寶背月痕、月紋和星紋錢的演變：根據目前國內錢幣學界認定開元錢的鑄造是泥質範模的情況，所謂背月痕錢有可能是在冶鑄過程中成品錢從高處掉下砸模所致，再鑄時痕迹即留在錢背。但這種無意識、無規則背直畫紋的現象，却爲後來鑄錢帶來了新的啓示，以致唐代人們有意識地鑄造各種背爪紋、月紋和星紋錢，成爲區分爐別的標志，後世背星月紋錢亦鑄行了一千多年，一直延續到清代末年才結束。

唐代所鑄開元錢經歷了一個“從無意識、無規則、任意部位背月痕(直畫，亦稱假月紋)的發生階段——到有意識、有規則、固定部位背爪紋的發展階段——再到有意識、有規則、固定部位背彎月紋的鼎盛階段——再至會昌開元有意識、無規則、任意部位背月紋的衰亡階段”。經過分析，各類開元錢未必都要經過以上四個階段。原因是唐代各州鑄錢有先後，有的唐初武德年間(公元618—626年)即已開鑄，有的可能唐中期天寶年間(公元742—756年)才開鑄，甚至唐晚期開鑄的也有。

開元錢文書法分類、月紋形狀不同及位置不同區分的意義有可能解決各類錢的鑄地、鑄爐的識別問題，爲最終解決斷代問題提供幫助。據史載，會昌前，唐代鑄錢的州郡有二十幾個，鑄錢爐99座。開元通寶按錢面文字筆畫書寫不同有25類，各類開元錢背鑄月紋合計有120種左右，這比已知唐代鑄地、鑄爐數稍多一些。原因是，爲了解決銅幣缺乏、錢荒的問題，當時各州都可以鑄錢，實際鑄地、爐數多于史書記載當在情理之中。由此可知，開元錢文筆畫變化分類的不同，可能反映了鑄地的不同；爪紋、月紋或其位置的不同亦反映了爐別

的不同；各類鑄錢數量多少的不同，似乎又反映了各州開鑄先後時間、爐數的不同。

乾元重寶的鑄量在唐代僅次于開元通寶。按錢文書寫的變化可分為15類。如果錢文書法的不同反映鑄地的不同這一論斷正確的話，那麼乾元年間(公元758—760年)全國大約有15州在鑄錢，至會昌年間(公元841—846年)增至25州左右。背星月紋及位置的不同，或許反映了鑄錢爐與爐之間區分的標志不同。“會昌年間或會昌以後，似乎還鑄造過乾元重小平錢，因為這種錢的背面，也有加鑄州名的。但數量極少，大概限于豫章和丹陽等郡”(彭信威《中國貨幣史》)。

唐代含鐵錢，磁吸力有大小，含鐵量亦有高低。唐初含鐵錢少，中期以後漸多。尤其是扁口通類開元錢，含鐵錢幾乎占到該類錢的一半。這類含鐵錢似乎為官鑄品，其輕重大小、精美程度與官鑄銅錢相比絲毫不遜色。目前尚不清楚的是，這種含鐵錢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各種金屬成分的比例是多少。由于錢體有鐵銹，以至于人們常把這種含鐵錢誤為鐵錢。

唐代是否鑄行過鐵錢，史無記載，長期以來也沒有出土發現，人們以為唐代無鐵錢。但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現鐵錢的信息先後見諸國內報端。有的一次出土開元鐵錢即重達數百斤，有的泉譜亦列有開元鐵錢，并附有錢拓，人們將信將疑。然筆者經過二十餘年的集幣實踐與探索，逐一過手的十余萬枚唐開元、乾元錢中始終未能發現一枚真正意義上的鐵錢。在與國內南北泉友的交流中，所見所謂鐵錢，經銼磨皆露銅色，無一不是含鐵錢。查閱此前國內發現開元鐵錢的報道及所附錢拓，皆與本書各類含鐵錢拓圖相同。此前國內報道發現的所謂唐代鐵錢，極有可能都是含鐵錢。

唐代鑄行開元通寶錢，在中國貨幣史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創舉，既開創了中國錢幣的新紀元，也在世界鑄幣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一是貨幣稱“寶”的影響。自唐朝起，一改過去的稱量貨幣，而改稱通寶、重寶、元寶等等，并冠以年號。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交易量的增大和繁榮，貨幣稱寶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出來。

二是對中國衡法改為十進位的影響。開元錢的大小輕重，基本是仿漢五銖錢。標準的官爐鑄錢每枚直徑八分，重二銖四綮，每十文重一兩。後代不再稱綮，而稱一錢，意即開元通寶一文錢的重量，這是中國衡法改為十進位的關鍵，開元錢的輕重大小是後世鑄造小平錢的楷模。

三是鑄幣面背星月或其它紋飾的影響。唐以前，歷代鑄錢多素背少有星月紋，即便有也極稀見或多為無意識、無規律、無固定部位。自唐代起，錢幣的面背就大量加鑄星月紋了。至唐中期，錢幣加鑄星月紋已是很普遍的事了。這種在錢幣的面背上加鑄星月紋，或其它紋飾的做法，一直延續到清代末年纔結束，如光緒通寶面背仍有各種星月紋。

四是對周邊國家鑄錢的影響。“唐代國勢隆盛，貿易發達，商賈所至，銅錢流布，遠到波斯灣的西拉夫也有中國銅錢。日本也輸入中國銅錢。當時日本同中國接觸頻繁，在睿宗

元年即遷都奈良之前兩年，已開始鑄錢，形式與中國的開元錢相似，可見中國錢早已流入日本”(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345頁)。現已知，公元708年，日本鑄“和同開珎”錢。公元970~978年，越南鑄“太平興寶”錢。公元998年，朝鮮鑄“乾元重寶”錢。這些錢文形制特徵皆由唐錢仿鑄而來。

研究唐錢，可以總結唐代貨幣發行的經驗教訓，更好地為現代經濟建設服務。在唐代，有的貨幣鑄行不到一年就行不通而廢止了，而開元錢却能在唐代幾百年間一直發揮作用，此類貨幣在唐以後還流通了一千多年，這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這與其優越的貨幣制度、錢幣大小輕重規格的統一、錢文的書法藝術美、錢幣精緻規整的外形美是分不開的。透過唐代貨幣的分類，我們也大體上看到了唐代全國各地鑄錢的概況。當前在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金融貨幣理論與實踐方面，認真研究唐代貨幣，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得壹元寶當百錢，是唐叛將史思明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占據東都洛陽時鑄。當年夏四月，史思明惡“得壹”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由于得壹元寶鑄行僅三月即改鑄順天元寶錢，故有“順天易得，得壹難求”之說。這兩種錢除素背外，另有背星、月、雲紋等類錢，錢徑、重量皆有差別。

五代時期，政治分裂，年年混戰，各國雖都鑄幣，但都較單一，除後周鑄幣較多外，其餘四國鑄量都不大。

後梁朱溫(公元907—912年)鑄開平通寶、元寶，世僅存大銅錢各一枚，其真偽尚不能確定。另有開平元寶小鉛錢一枚，係南漢劉隱奉梁正朔而鑄。後梁時期，多沿用唐開元錢，自鑄錢并不多。

後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間(公元926—930年)鑄天成元寶小平銅錢，面文旋讀，背素無紋飾，製作精美，文字清晰，“元”字多右挑。後唐與後梁一樣，市場交易也是多沿用唐舊錢，自鑄錢很少。

後晉石敬瑭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十一月鑄天福元寶小平銅錢，面文右旋讀，直徑在23.5毫米以下，另鑄有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小平錢。但錢體薄小多平背，徑、穿、郭、重和天福元寶接近。

後漢隱帝劉承祐乾祐元年(公元948年)鑄漢元通寶。《續通典·食貨》：“劉隱帝時三司王章……請在京置爐鑄錢……以濟軍用。”錢文形制仿唐開元通寶，多背星月紋，錢徑在25毫米以下。

後周顯德二年(公元955年)，廢天下寺院三萬餘所，以廢舊銅材等納官鑄周元通寶，錢形規整，鑄造精美，面文清晰，筆畫精到，是五代時期錢幣中的佳品。周元通寶除素背外，多鑄有規則的星紋、爪紋和月紋，錢徑一般在26毫米以下，重量一般不會超過3.7克。

十國時期，政治割據，歷年戰爭，唯吳、南平和北漢仍用唐舊錢，其它諸國皆鑄行貨幣。但錢法混亂，數量多寡不一，質量優劣參差不齊，鑄幣材質、輕重大小亦不同，出現了區域性的貨幣貶值現象。

王建占巴蜀，史稱前蜀，鑄行永平元寶、通正元寶、天漢元寶、光天元寶。其子王衍鑄乾德元寶、咸康元寶。《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成武)三年(公元910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舊五代史·僭偽列傳》：“建自帝于成都，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天漢，又改元光天。”王建所鑄均爲小平銅錢。《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卒，子衍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七年)衍改元曰咸康。”王衍所鑄亦均爲小平錢，乾德有鐵錢。前蜀錢鑄造皆欠精，形制多粗劣，除素背外，多有星月紋。

孟知祥占今四川及陝西南部，史稱後蜀，鑄行廣政通寶銅鐵鉛錢。《資治通鑑·後周記》：“僞蜀廣政中，始鑄鐵錢，每鐵錢一千，兼以銅錢四百，凡銀一兩，直錢千七百，絹一匹，直錢一千二百，而鐵工精好，殆與銅錢等。”銅錢應鑄在鐵錢之前，銅錢徑25.3毫米以下，重量一般不超過4.7克。大蜀通寶，錢徑24毫米，重3.5克。

南唐疆域廣闊，物產豐富，鑄錢也最多。大齊通寶是徐知誥篡吳位、立國稱帝、國號大齊改元升元時鑄，現已流失，欲見無門。保大元寶有銅鐵大錢，泉界多認爲是李璟保大年(公元943—957年)所鑄。但這兩種錢史書皆無記載。永通泉貨按材質有銅鐵錢，按書法有隸篆之分，亦爲李璟所鑄。《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璟困于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續唐書·元宗紀》：“交泰二年(公元959年)，……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以一當十。”隸書，錢徑約40毫米，重15克左右。篆書錢形較小，徑爲29—35毫米，至今僅發現數枚。南唐錢數量最多而見諸史書的有開元通寶、唐國通寶和大唐通寶三種。開元通寶錢文細小，外郭闊，隸篆書成對，謂“對錢”，隸書又有背四決紋錢。《十國紀年·南唐史》：“元宗……鑄唐國通寶，二當開元一。”錢文有真隸篆三體，材質銅鉛都有，背穿上多鑄巨星紋。《十國春秋·南唐史》：“元宗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三年春三月始鑄錢，其錢之大小如開元通寶，徐鉉篆其文。”銅鐵銀錢都有。另有“大唐鎮庫”傳世錢一枚。僅見特大型開元通寶反書背上仰月錢，與唐國通寶背巨星錢形制相同，此前諸譜列爲閩錢，范文海等先生考證認爲：“開元通寶背巨星大鐵錢不是五代閩國錢幣，而是南唐在福建建州設置的永豐監鑄造，并在南唐占領的福建區域行使的南唐鑄幣。”銅錢文字形制與鐵錢相同，那麼銅錢當爲南唐鑄幣無疑。

公元896年，馬殷據今湖南之地，公元907年受梁封爲楚王，建都長沙，其疆域曾達廣西東部，公元951年爲南唐所滅，共立六主，45年。楚王馬殷受梁太祖封爲天策上將軍，建天策府，鑄天策府寶銅鐵大錢，背素無紋飾，錢徑35—41毫米，重量差別大，10—44克不等。除素背外，計有背“天”、“策”、“天策”、“天府”、“策府”等大錢。銅錢有背“天”、“天府”等。鐵錢有乾元重寶，錢法混亂，筆畫各異，傳世有大小數品，均珍貴罕見。

閩國的建立者是王審知，後梁時，受封爲閩王，今福建全省除南隅一小部分外，皆其地。閩王王審知(公元909—925年在位)鑄行開元通寶錢，有當百、當十及小平三種，銅鐵鉛并行。小平爲鉛質鑄幣，除素背外，背多鑄“福”、“閩”、“殷”字。永隆通寶錢是閩王王

延義永隆年間(公元939—942年)所鑄，錢徑爲當十型，背鑄“閩”字、月紋，銅鐵鉛錢并行。閩王王延政天德二年(公元944年)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傳世有天德通寶素背大錢、天德重寶背“殷”銅鐵大錢，其它材質未聞。

劉隱據有嶺南交趾地區，隱卒，其弟襲嗣立，稱帝，國號越，後改爲漢，史稱南漢。鑄行乾亨通寶、乾亨重寶銅鐵鉛錢，在其境內流通使用。今僅見銅鉛錢，鐵錢未見。《舊五代史》劉陟傳記載，後梁貞明三年(公元917年)八月，“陟乃僭號于廣州，國號大漢，僞改元爲乾亨”。《古泉匯考》引《十國春秋》：“南漢高祖乾亨元年(公元917年)，鑄乾亨重寶錢。二年，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今所見乾亨通寶小平銅錢，背素無紋飾，徑23—24毫米，重2.9—4.1克。乾亨重寶小平銅錢，徑24.4—23.3毫米，重3.25—4.5克。鉛錢廣穿狹穿并見，大小厚薄不一，製作不精，形制不甚規則，徑25—27毫米，重3.4—6.3克。另有傳形、“亨”字反書及背“邑”錢，不易見。開元通寶、乾元重寶、五五鉛質背字及背數字套錢也是南漢鑄錢的特色之一。

長期以來，泉界一般認爲吳越國沒有鑄行貨幣。然而，1986年在浙江嘉興中山路拓寬工程中出土不少鉛質開元錢，後又在1987年湖州儀鳳橋改建中出土鉛質開元錢達幾千枚之多，并同時發現銅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和五銖鉛錢，出土的錢十國氣息濃厚。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幣史綱要》指出：“吳越、北漢也曾鑄過錢。”河南省錢幣學會《古錢索引》說，公元957年吳越國忠懿王錢弘俶沿唐舊制，鑄開元通寶錢。嘉興地區屬古吳越國，爲抵制楚、閩、南唐等周邊國家鉛錢而專門仿唐形制鑄錢當在情理之中。所鑄錢徑多在21毫米左右，鑄造欠精。

劉仁恭父子盤踞幽州期間，“(仁恭)令燕人用墼土爲錢，悉斂銅錢(原爲錢鏰)鑿山而藏之”(《新五代史》劉守光傳)。但史傳未記載劉仁恭鑄永安銅鐵錢。仁恭被其子守光幽禁後，“守光……以(後)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今所見永安錢值分四等：一十、一百、五百、一千，鐵錢多，銅錢罕。順天元寶背月、“千”大鐵錢，泉界先輩方藥雨舊藏，僅見品。另有順天元寶背月、“百”鐵錢、背巨星當百鐵錢和背“一十”銅錢，皆難得一見。應天元寶背“萬”和乾聖元寶(或釋乾元重寶)背上“百”皆爲張叔馴舊藏。應聖元寶背“拾”銅錢，今存世三枚均已流入日本，欲見不易。貨布背“三百”鐵錢，采取王莽貨布改鑄，北京房山大王山下出土，背文“三百”二字地位有高低不同版別。另說有銅錢，未見。

西域(今新疆)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各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員，在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十國時期的幾百年間，從西域各少數民族所鑄行的龜茲錢、高昌吉利、粟特文錢、于闐文錢、突騎施錢、日月光金錢和回鶻文錢中既可看到中原文化對西域各歷史時期文化的深遠影響，又可看出西方文化對其鑄幣的影響，這是因爲絲綢之路的緣故，因而融合東西方文化是西域貨幣的主要特色。西域貨幣是中華民族錢幣文化中的瑰寶。